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续完)

刘涤源 傅殷才

五 生产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只求就业在水平上之量的增长，还要求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

凯恩斯就业理论和政策的主旨在于：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扩大就业，达到充分就业的境界。同时，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就业增加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成为增大就业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些论点方面，论战双方没有多大分歧。在这里，分歧主要在于究竟要扩大什么样的就业。这就是，在扩大就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不管就业之质的内容，只单纯追求就业之量的水平提高，还是不仅要增大就业的总量，而且更应该注重就业的质——在内容上的合理安排；即不仅要做到生产资源之量的充分利用，而且应该做到它们之质的合理配置。在政策运用方面，这种分歧就表现为：一方主张在做到就业之量的增大的同时，还应该通过投资社会化的政府管制，注意就业之质的合理安排，做到就业在内容上的合理配置；另一方则主张由政府出钱——中央银行供给必需的总的购买力，交给私人办事，凡是有钱可赚的事项都是合理的，由民营企业去自由经营，政府不进一步去干预生产资源的具体配置。

我们知道，凯恩斯本人明确提出了关于国家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实行投资社会化的论断，其主要论点如下：

(一) 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特别是对投资进行干预，有其极端重要性。凯恩斯写道：“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①

(二) 投资要由政府来综揽，不能委诸私人企业家之手；政府综揽投资事项的具体目标，一是规定达到的投资总额应为多大，二是规定生产资源之持有者的报酬应各为多少。同时，关于投资社会化的具体做法，必须是慢慢地逐渐进行，不要打断现行社会的一般传统。

(三) 对投资社会化的政府管制规定了明确的限度：不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让私人策动力能适当得到发挥。这就是说，由政府出钱——扩大政府开支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让私人办事——发挥私人策动力去从事生产，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均由私人资本家去决定。

(四)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论述“投资社会化”问题时，只强调由政府规定投资总量，没有提到、至少没有明确提到投资和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

萨缪尔森根据凯恩斯的上述教义，主张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创造正确数量的购买力，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

首先，萨缪尔森认为，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里，每一个公私合伙的混合经济具备了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有效的知识和能力，创造足够的购买力，已经成功地在整个地球上把慢性肖条这种恐惧消除掉：不仅把由消费不足引起的失业消除掉，而且把因自动化所引起的失业也消除掉。而且，他还认为，可以用和平时期的政府开支去完成这一任务，而用不着借助于战费开支；在国内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知识能够为充分就业创造所必需的购买力。萨缪尔森对凯恩斯主义混合经济的威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知识及其消除失业的能力的有效性，信心十足，歌颂备至。

其次，萨缪尔森强调“高度就业要求正确数额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就业水平向上移升到所需要的就业总量。一句话，他只追求就业水平之总量的提高，根本不谈就业内容之质的配置。

最后，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去达到这个目标呢？在萨缪尔森看来，首先，通过政府扩大开支，弥补私人开支之不足（特别是投资开支之不足），使国民总产值达到充分就业的新水平。政府干预即到此为止，不再进一步追求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其次，在创造购买力方面，确保高度就业所需的足够而正确的数额以后，那就坚持“政府出钱、私人办事”的方针，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根据市场作用一手承办。这就是他所说的：“在混合经济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基本经济问题主要为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所解决。”^②这就意味着，在公私合伙的混合经济中，公的部分由政府扩大开支，然后交由私的部分——垄断资本家自由放任地加以经营，只求就业总量的提高，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就业。做到就业水平在总量方面达到充分就业境界，萨缪尔森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萨缪尔森的上述观点，罗宾逊严辞指责，认为后凯恩斯主流派只重视就业水平（就业之量的增长）的提高，而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即就业的内容（就业之质的分配），并说这是她一生中经历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首先，罗宾逊明确指出，她一生中遭遇过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the level of employment）之理论的破产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the content of employment）的理论而产生的。”^③三十年代大经济危机之前，新古典学派传统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大经济危机爆发，就业水平空前严重下降，旧传统理论无法加以解释，经济理论陷于极度混乱状态，她把这种状态说成是她一生中遇到的经济理论第一次危机。从这次危机中凯恩斯革命脱颖而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了新的正统派，但后凯恩斯主流派——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却忽略了就业问题的本质，不改变议题，去讨论就业的内容，即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就业？由于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就业的内容问题而明显地趋于破产，因而产生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其次，罗宾逊严厉指责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只注重就业在水平上之总量的提高，忽视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即只顾政府扩大支出去追求就业总量的增长，却忽视政府这些开支究竟应该是为了什么样的就业；也就是，为了单纯追求就业总量的增长，不惜让私人垄断企业追求利润而继续把地球啃光，却忽视生产资源为了人类需要而进行合理利用。

她指责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并没有真正做到近乎充分就业、而同时又没有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理论第一次危机并没有解决。因为经济理论第二次危机同第一次危机是紧密联系的，这就意味着，冒牌的凯恩斯理论既要为第二次危机负责，又要为第一次危机未能得到真正的

解决负责，也就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失败负责。

最后，罗宾逊指出，私营企业制度固有缺陷的最熟悉的要素仍然极其重要，这就是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她重申，凯恩斯认为“将有必要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管制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短期不稳定性。从长期来看，社会管制的缺乏更为严重。”^④她谴责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关于“政府出钱、私人办事”的主张，投资社会化只限于“政府出钱”这一步骤，下一步骤就“重提旧时的自由放任的保护：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是恰当的”，这就是“以过度储蓄的唯一缺点恰好将要被消除为条件，却转过来把这个论点变为维护自由放任”。^⑤

她谴责冒牌的凯恩斯理论使“我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认为我们必须让大公司这出戏(performance)继续表演下去，它们异常灵活地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同时却极其强硬地抵制社会管制。我们所能要求大企业的一切，只是它们愿意给我们的。既然政府想要就业增大，它们就只会把工业推向唯利是图的轨道上去，如果设想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消灭贫困和恢复和平，那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她在理论上，不仅追求就业水平上之量的增长，而且要求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在政策上，她坚决主张把凯恩斯关于投资社会化的社会管制，不仅止于政府扩大开支去增大就业总量，而且要进一步消除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做到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安排。

两个“剑桥”关于生产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和充分就业问题等的争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罗宾逊批评美国剑桥派萨缪尔森等人回复到自由放任，把有利可图的事情看作是对的，指责他们容许垄断企业把地球啃光，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畸形发展。她还指出，在第三世界，“不平等日益扩大”，“贫困大为加深”，在富裕国家，仍然还有“贫民窟”，“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贫困却增长了”。罗宾逊的这些批评和揭露，是切中资本主义时弊的。但问题在于，双方均把问题局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就不能不使这些争论成了空谈。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上述弊端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所谓“充分就业”在资本主义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特别是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和开工不足，必然造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双方的主张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六 对凯恩斯革命的评价问题：是弊端丛生还是百事顺遂，是悲剧还是胜利？

凯恩斯方案“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疗效”如何？凯恩斯革命的历史地位如何？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两个“剑桥”对这两个问题的评价截然相反。

首先，经过凯恩斯方案长期治疗的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是健全顺遂，前程似锦；还是弊害丛生，前途暗淡？双方评价分歧很大。新剑桥学派，特别是罗宾逊对经过凯恩斯方案治疗的资本主义经济现状大为不满，甚至愤慨到发出抗议。她认为，长期推行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旧病(失业、分配极为不均和富裕中的贫困等)没有消除，而且又发生了新病如“滞胀”、污染等等。而后凯恩斯主流派，如萨缪尔森和托宾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和前景歌颂备至，认为百事顺遂，仿佛势将进入“太平盛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

主义在西方世界各国，特别是在英美等国，推行十分广泛而彻底，避免了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严重萧条，但同时出现了不少弊端。罗宾逊尖锐地指出了这些弊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继承着乃师凯恩斯的悲观情调。而萨缪尔森之流则极度强调凯恩斯方案的“积极成果”，对各种弊端，或则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或则轻描淡写，搪塞开脱。这就是双方对资本主义现状和前景在评价上分歧的焦点。

其次，与上述评价紧密联系的，就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历史地位在评价上的重大分歧。新剑桥学派、特别是罗宾逊坚决认定：凯恩斯革命是一个悲剧；而后凯恩斯主流派、特别是萨缪尔森则适得其反，确信不移地硬说是一种胜利。

罗宾逊不无正确地指出，凯恩斯确认的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和“富裕中的贫困”并未消除，而且具有了新的意思。更加重要的是，她对西方世界各国长期推行凯恩斯治疗方案产生的种种新的弊端，提出了如下尖锐的论断：

第一、她确认高度就业和高额利润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导致工资补偿性提高，而工资提高又导致物价再上涨。这样，螺旋式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的困境就顽固地形成了。她认为，早在1973年滞胀爆发以前，原料价格已经陡涨，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已经酝酿多年，石油禁运和提价只不过是触发通货膨胀的导火线而已。她对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会持续那末长，感到惊奇；因此，她对后来爆发出来的滞胀并不感到意外。她推断：战后长达25年内，经济持续增长而通货膨胀又能保持温和水平的那种年代，已经最后消逝；既然自由市场制度的病毒成分已经那样恶性发作，那就很难找出回到那种美好年代的任何途径。她把滞胀这种弊害，归咎于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暗中抹去了凯恩斯关于高度就业和高额利润会导致物价不断上涨的论点。

第二、她谴责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对人类需要的危害作用，垄断大公司接受政府支出的公共援助，但热衷于追逐利润，把科学和生产引入歧途，脱离了人类的真正需要。在城镇和地区的兴盛或衰败上，听任垄断公司的摆布：大公司在—一个地方设立工厂，那里就趋兴旺；一旦它撤离该地，就顿形衰落。大公司垄断生产，损伤消费者的利益。生产对消费者的爱好进行支配和摆弄，以汽车为例，由于剥夺公共运输的要求，提高公共运输的费用，最后使之不能存在，直到凡不是赤贫者都不得已而使用汽车，而那些赤贫者却不得呆在家里，这样，汽车工业便增加了它自己的销路。大公司生产出商品，控制了价格，垄断了市场，竭力设法让消费者听从其支配。她认为，电视广告创造整个新型的社会生活，个体消费者不是自由选择，而是已被诱骗而去从事购买。

第三、她指责“重提旧时的自由放任保护”：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是恰当的。她举污染问题为例，把它看成是这个学说之最奇怪的应用。这个学说认为，反污染规定正在阻碍投资和减少利润，这不利于充分利用资源，增加就业；因而主张允许污染稍为长一点，以便有助于从萧条走向复苏。为了利润，必须牺牲环境的舒服和人体的健康。而工人们尽管不愿意受到污染的毒害，但更忧虑、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在资源枯竭问题上，必须允许大公司继续把地球啃光，否则，它们就不能赚取利润和提供就业。

第四、她对政府扩大开支，为军备生产大开方便之门，严辞指责，说它帮助了冷战的继续，也推动世界各地热战的进行。她指出凯恩斯政策并没有真正用来维持经济稳定，倒确实很象卡莱斯基所预言的“政治上的商业循环”。在美国，“政治上商业循环”是这样表演的：当需要政治高涨时，扩大的就是军费开支；当需要政治衰退时，被削减的就是社会服务。

正由于以上诸情况，罗宾逊公开申明：“我并不把凯恩斯的革命看成一次重大的智慧的胜

利。正相反,这个革命是一出悲剧……。”^④

恰好相反,关于对凯恩斯革命的评价问题,不论在它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疗效”上,还是在它的历史地位上,后凯恩斯主流派坚定不移地抱着歌颂备至的态度。同时,他们对罗宾逊在这方面的指责也有如下的辩解:

第一、托宾对罗宾逊夫人关于各种新弊端的指责,拒不接受,并且反讥为“荒谬可笑的”、“漫不经心的”。同时指出,这些指责并不新鲜,其他流派,如新左派,也有同样的说法。而且认为这些指责,只有论断,而没有提供充分的根据和理由,也没有阐明详细的具体情况,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第二、托宾指出,近十年来对这些弊端有着大量的研究工作,而罗宾逊夫人对此恰好全然无知。他对罗宾逊指控关于主流派要分担冷战和越南战争的罪愆,矢口否认,坚决认定,“不论是美国的经济,也不论是新经济学家,都不需要越南战争来维持充分就业。”^⑤

第三、关于通货膨胀问题,他坚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者是不可得兼的。他信赖菲利普斯曲线关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的交替关系。同时认为通货膨胀是可以制止的,但又自相矛盾地说,整个世界的物价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还是不可抗拒地趋向上涨。最实质性的论点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社会代价大大地夸张了,其实并不那么可怕,问题在于“我们到底应该把目标放在失业上还是放在通货膨胀上”,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而公开的辩论。言外之意是说,他是主张把目标放在维持充分就业上,这就必须对通货膨胀这个病症作出牺牲。

总之,后凯恩斯主流派认为,凯恩斯革命在促进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成就,它胜利了。萨缪尔森甚至声称,“如果凯恩斯能够从坟墓回来,可能会说,‘我已经预见到了现在,果然如此!’”^⑥

※

※

※

从上面对“两个剑桥之争”的整个介评可以看出,在西方经济学中,罗宾逊被称为“左派凯恩斯主义者”,把萨缪尔森看作凯恩斯主义“右派”,不是没有道理的。罗宾逊的一些论点比较符合当今资本主义现实,较为激进。她对资本主义某些弊端的揭露和批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某些错误的非难,是有参考价值的。而萨缪尔森等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却是十分露骨的,有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然而,尽管两个“剑桥”相互攻击,各自辩解,越来越激烈,但他们面对失业,以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两症并发的困窘局面,谁都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在新型自由经营论(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声势日益显赫,对凯恩斯政府干预论的指责振振有词面前,更是十分尴尬。当然,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两个“剑桥”是围绕着凯恩斯理论展开辩论的,而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已。所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凯恩斯学派分崩离析的表现,也是凯恩斯主义破产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危机加深的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释: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3—324页。

②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8页。

③④⑤⑥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38、40、31、13页。

⑦ 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

⑧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下册,第332页,参照原文,译文略有更改。